

建筑遗产保护丛书

东南大学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朱光亚 主编

明代江南园林研究

GARDENS OF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PERIOD

顾 凯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建筑遗产保护丛书

东南大学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朱光亚 主编

明代江南园林研究

GARDENS OF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PERIOD

顾 凯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深入翔实的史料发掘基础上,对众多明代江南园林实例作出详细的考察,并以园林观念和造园实践两方面为切入点,在历史文献构筑的语境中展开具体命题的分析,揭示出江南造园在明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变化。

本书将明代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进行研究,每个时期的江南园林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初期冲击剧烈、陷入低迷,中前期重塑形象、渐复元气,中期风气剧变、转向繁荣,而晚期更是辉煌全盛而又有深刻转折——园林不仅获得空前的地位,而且通过“画意”营造标准的确立,造园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自身独立的形态审美价值。从而,中国园林史上第一次诞生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园林创作理论著作,第一次出现“造园艺术家”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前所未有的成就了一大批营造复杂、景致精美的“名园”,而园林营造技法在叠山、理水、花木、建筑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大影响了中国造园史的进程。

本书可供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风景园林、艺术史、文化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江南园林研究/顾凯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3

(建筑遗产保护丛书/朱光亚主编)

ISBN 978-7-5641-2010-8

I. 明… II. 顾… III. 古典园林—研究—华东地区—
明代 IV. TU986.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589 号

| | |
|------|---|
| 出版发行 | 东南大学出版社 |
| 出版人 | 江 汉 |
| 网 址 | http://press.seu.edu.cn |
| 电子邮箱 | press@seu.edu.cn |
| 社 址 |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
| 邮 编 | 210096 |
| 电 话 | 025-83793191(发行) 025-57711295(传真)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排 版 |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印刷分公司 |
| 印 刷 | 南京玉河印刷厂 |
| 开 本 | 889mm×1194mm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616 千 |
| 版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41-2010-8 |
| 印 数 | 1~2 300 册 |
| 定 价 | 60.00 元 |

继往开来,努力建立建筑遗产保护的现代学科体系^①

建筑遗产保护在中国由几乎是绝学转变成显学只不过是二三十年时间,差不多五十年前,刘敦桢先生承担瞻园的修缮时,能参与其中者凤毛麟角,一期修缮就费时六年,三十年前我承担苏州瑞光塔修缮设计时,热心参加者众多而深入核心问题讨论者则十不一二,从开始到修好费时十一载。如今保护文化遗产对民族、地区、国家以至全人类的深远意义日益被众多的人士认识,并已成各级政府的业绩工程。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不过,单单有认识不见得就能保护好。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认识其重要性而不知道如何去科学保护或者盲目地决定保护措施是十分危险的,我所见到的因不当修缮而危及文物价值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在今后的保护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保护体系,从过去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要建立这样一个科学的保护体系并非易事,依我看至少要获得以下的一些认识。

首先,就是要了解遗产。了解遗产就是系统了解自己的保护对象的丰富文化内涵,它的价值以及发展历程,了解其构成的类型和不同的特征。此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保护学科本身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因而还包括要了解保护学科本身的渊源归属和发展走向。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CAD技术、GIS和GPS技术及新的材料技术、分析技术和监控技术等大大拓展了保护的基本手段,但我们在努力学习新技术的同时要懂得,方法不能代替目的,媒介不能代替对象,离开了对对象本体的研究,离开了对保护主体的人的价值观念的关注,就是目的沦丧了。

其次,要开阔视野。信息时代的到来缩小了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也为人类获得更多的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保护科学的体系构成日益庞大,知识日益精深,因此对学科总体而言,要有一种宏观的开阔的视野,在建立起学科架构的基础上使得学科本身成为开放体系,成为不断吸纳和拓展的系统。

再次,要研究学科特色。任何宏观的认识都代替不了进一步的中观和微观的分析,从大处说,任何对国外的理论的学习都要辅之以对国情的关注;从小处说,任何保护个案都有着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性质,类型的规律研究都要辅之以对个案的特殊矛盾的分析,解决个案的独特问题更能显示保护工作的功力。

最后,就是要通过实践验证。我过去多次说过,建筑科学是实践科学,建筑遗产保护科学尤其如此,再动人的保护理论如果在实践中无法获得成功,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同,无法解决案例中的具体问题,那就不能算成功,就需要调整甚至需要扬弃,经过实践不断调整和扬弃后保留的理论才是保护科学体系需要好好珍惜的部分。

潘谷西

2009年11月于南京

^① 本文是潘谷西教授为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成立写的一篇文章,征得作者同意并经作者修改,作为本丛书的代序。

丛书总序

建筑遗产保护丛书是酝酿了多年的成果。大约是1978年,东南大学通过恢复建筑历史学科的研究生招生开始了新时期的学科发展继往开来的历史。1979年开始,根据社会上的实际需求承担了国家一系列重要的建筑遗产保护工程项目,也显示了建筑遗产保护实践与建筑历史学科的学术关系。1987年后的近十年间东南大学发起申请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的中国建筑历史多卷集的编写工作,研究和应用相得益彰;又接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举办古建筑保护干部专修科的任务,将人才的培养提上了工作日程。九十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组织后,建筑遗产的保护走上了和世界接轨的进程。人才培养也上升到成规模地培养硕士和博士的层次,在开拓新领域、开设新课程、适应新的扩大的社会需求和教学需求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除了取得多卷集的成果和大量横向研究成果外,还完成了教师和研究生的一系列论文。

2001年东南大学建筑历史学科经评估成为中国第一个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国家重点学科。2009年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获准成立,并将全面开展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将实践凝练的科学问题的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承担起来,形势的发展对学术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前辈奠基及改革开放后几代人工作积累的基础上,专门将建筑遗产保护方面的学术成果结集出版,是为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丛书。

这里提到的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学术成果是由前辈奠基,绝非虚语。今日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运动已经成为显学且正在接轨国际并日新月异,但其基本原则: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普世精神和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相结合的原则,早在营造学社时代就已经确立,这些原则经历史检验已显示其长久的生命力。当年学社社长朱启铃先生在学社成立时所说的“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的立场,“以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的眼光和体系,“沟通儒匠,睿发智巧”的切入点,都是今日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中需要牢记的。

当代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发端于欧洲并流布于全世界,建立在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及其衍生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又经文艺复兴弘扬的欧洲文化精神是其立足点;注重真实性,注重理性,注重实证是这一运动的特点,但这一运动又在其流布的过程中不断吸纳东方的智慧,1994年的《奈良文告》以及2007年的《北京文件》等都反映了这种多元的微妙变化;《奈良文告》将原真性同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可谓明证。同样,在这一文件的附录中,将遗产研究工作纳入保护工作系统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认识。因此本丛书也就十分重视涉及保护的东方特点以及基础研究的成果了。又因为建筑遗产保护涉及到多种学科的多层次的研究,丛书既包括了基础研究也包括了应用基础的研究以及应用性的研究,为了取得多学科的学术成果,一如遗产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是开放性的一样,本丛书也是向全社会开放的,欢迎致力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者向本丛书投稿。

遗产保护在欧洲延续着西方学术的不断分野的传统,按照科学和人文的不同学科领域不断在精致化的道路上拓展;中国的传统优势则是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营造学社在接受了欧洲

的学科分野的先进的方法论后却又经朱启钤的运筹和擘画在整体上延续了东方的特色。鉴于中国直到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这种东方的特色是符合中国多数遗产保护任务,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保护任务的需求的,我们相信,中国的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会向学科的精致化方向发展,但是关注传统的延续,关注适应性技术在未来的传承依然是本丛书的一个侧重点。

面对着当代人类的重重危机,保护构成人类文明的多元的文化生态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的有识之士的另一种强烈的追求,因而保护中国传统建筑遗产不仅对于华夏子孙,也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在认识文明的特殊性及其贡献方面,本丛书的出版也许将会显示另一种价值。

朱光亚

2009年12月20日于南京

序

顾凯的博士论文《明代江南园林研究——园林观念与造园实践》，是2008年5月答辩通过的，同年7月，由他签名给我寄来一份打印本，打印精良，和正式出版物相差不多。这本论文我很珍爱，一直放在床头书架上，不时翻看。近几年我参加过几次博士论文答辩会，特意请我看过的几位建筑史博士论文都写得不错，不愧是名师高足，顾凯这部园林史论文写得最好。他的导师朱光亚教授是我的至交，我常往东南大学跑，不仅朱先生的研究生，张十庆先生、陈薇先生以及郭湖生先生生前带出来的研究生都对我格外亲敬。我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朱先生总是要我为他们的研究生另外单开讲座，不过我没有讲过园林史的话题。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寓先生就著有《江南园林志》一书，江南园林的研究是童先生率先发起的。五十年代刘敦桢先生著《苏州古典园林》一书，苏州古典园林正是江南园林的翘楚。明代江南园林研究的命题最吸引人。我早年研究我国古典园林造园叠山艺术的发展演变，研究我国古典园林诗情画意的发生发展，研究我国古代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生发消长和相互影响，都归结到明代江南园林走上成熟的顶峰。我后来专门研究造园叠山大师张南垣、计成、戈裕良，更是以张南垣作为明代江南园林造园叠山艺术成熟的巅峰。明代园林是园林史上的黄金时代，江南园林更是黄金板块。我的意思是说，明代江南园林研究，应该是中国园林研究的最好选题。这个选题以前也有硕士生做过，今后再做还可以向纵深发展，如明代江南园林的造园艺术，明代江南园林的造园叠山，明代江南园林的造园大师，明代后期江南园林风范的转折等等，都是很好的选题。我要写一部《造园大师张南垣》，推誉这位巅峰人物，大约也可写成四五十万字。不仅明代，还有宋代、元代和清代的江南园林，也都应该作专题研究。

光是选题好还不行，研究方法还要对头。建筑史和园林史都属于文化史、艺术史的范畴，历史须要挖掘，不好停滞在浮浅的炒作层面。我们研究建筑史园林史的，都是工科出身，对历史较为陌生。我常说学风浮浅、学术腐败、文化水平太低，建筑史界还真有个别教授博导，好像历史和建筑史都还未入门，动辄弄出笑柄。写史学论著关键是以史带论，顾凯的论文题为《明代江南园林研究——园林观念与造园实践》，表明他的论述正是以史带论。以史带论也还要有创意，不能作老生常谈，更要摆平引史和发论的关系，发论不能太多，这里面的驾驭比较困难。议论要把握史识，识见高低和偏正，还会影响史实的选择。从前有人揶揄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位文学界朋友，对中国园林不很理解，专门批评“中天地”而曲解历史，竟是以论代史了。要在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史带论，要把讨论的造园观念之类，写得平实恰到好处，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我早年的园林论文有几篇是以论带史，都是纲领性的创见，不得不发。后来写的都是以史带论。

顾凯的论文最大的长处是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就是我常说的史源学材料。他自己在《后记》里说到，“尽管已经搜集到大量新的一手材料，但是仍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有待进一步发掘。”这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走过来之后的实话实说。我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很多记载又已失传，需要进一步搜寻偏偏又中间断档，再也找不到头绪。现代检索方法远不能齐备，原始办法如大海捞针。我近来写园林史，要找一批古代园林图，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上看到陈淳《薛荔园图》的著录，薛荔园是明正德年间徐缙的家园，广凡数亩，产荔枝，在洞庭西山，但是地方志上查不到，苏州人士写的《苏州历代园林录》和《苏州古典园林史》仅记有“徐子容园池”，未记出园名。在顾凯的论文中，不但译记出薛荔园的历史、陆深所撰园记，还从王鏊、邵宝、李梦阳、顾璘、薛惠、文征明、何景明、朱应登、景旸、袁袞等人的本集中录出不少他们和薛荔园的诗。能够把载入四库全书的薛荔园零散原始材料一网打尽，当然要靠电脑检索。可是在借助现代检索之前，还是要先知道薛荔园，不然就找不到深入进去的头绪。研究园林史搜集第一手史源学材料最为重

要。我一再强调史源学、年代学应该是人人都乐于接受和应用的。

我说起史源学总是和年代学咬在一起,年代学之运用更难一些。顾凯的论文非常注意这个问题,用得不错。我注意到他把每个园子的造年,每篇园记的作年,都尽量作了搜讨,园主人和园记作者的生卒年,可考的都已记出。因为年代学最为困难,也难免还有不到位的情况。叠山匠师周礼是他的一大发现,列在明代中前期也完全正确,又称他为“明代江南第一位得到记载的叠山师”。实际上陆叠山的年代要比周礼为早,也应该列入中前期,排在周礼之前,不应该列入明代中期。顾凯文中说起马世俊记陆舆敬所造晓园,列入明后期。实际上陆舆敬为清顺治十八年进士,“一丘一壑,自为位置”是在清初,不可列入明代。今人《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把马世俊《晓园记》错收在第三辑,当作明代,顾凯文中稍一疏忽,未能发现年代有误。这一例子正表明年代学与史源学是不可分的,这种疏忽有时还真难避免,年代学一直是治史学的艰难环节。(注:此二问题本书中已经改正。)

我自己没有读过研究生,也没有带过研究生,但是深知此中之苦。读建筑学本科和再读建筑历史研究生不是一个路子,做博士生三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开题写论文的时间不是太多,能够写出四十万字有分量的论文,该是多么不容易。这里面当然还熔铸了他的导师朱光亚教授的心血。顾凯在后面的《致谢》中非常动情地写道:“本论文的点滴成就都离不开先生的悉心指导,选题上的启发、引导,研究中的关注、探讨,困难时的宽容、鼓励,尤其是竭尽所能地为我个人提供研究条件、特别是研究材料的保障,都是这篇论文能够诞生的必要前提。先生的指导又绝不仅仅是这篇论文本身,而更在于对整体学术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能因材施教,注意加强我的薄弱之处,并以其博学、睿智,在言传身教中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得到进步,这些其实是在更深层次上成为论文写作的基础。而先生给予的培养,不仅是治学,还在于为人,在这七年的相处中我时时感受到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他这些话写得很真实、很感人。朱先生是我几十年的至交,我深知朱先生的为人为师和弟子们对他的爱戴,顾凯说的都是心里话。

顾凯的博士论文我感到很亲切,今将正式出版,是大好之事。朱先生要我写序,我义不能辞,赶上太忙,草草成此。还希望朱先生他们能推荐审评优秀博士论文。论文的正题我建议仅用《明代江南园林研究》,以为醒目。

曹 汛

2010年3月23日

目 录

| | |
|------------------------------|----|
| 1 绪论 | 1 |
| 1.1 研究对象与意义 | 1 |
| 1.2 已有研究与评述 | 3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 | 6 |
| 1.4 基本概念与问题 | 8 |
| 1.4.1 “明代”:时段的划分 | 8 |
| 1.4.2 “江南”:地域的范围 | 9 |
| 1.4.3 “园林”与“造园”:历史的概念 | 11 |
| 1.4.4 “观念”与“实践”:互动的层面 | 11 |
| 2 明代初期的江南园林(14 世纪下半叶) | 12 |
| 2.1 明初江南园林的境遇 | 12 |
| 2.1.1 元末江南造园的兴盛 | 13 |
| 2.1.2 明初江南园林受到的剧烈打击 | 16 |
| 2.1.3 明初江南园林文化的延续和变化 | 18 |
| 2.2 园林观念与造园作用 | 22 |
| 2.2.1 愉悦活动:乐趣的场所 | 22 |
| 2.2.2 园林重兴:象征的意义 | 24 |
| 2.2.3 出与处:志向的追求 | 25 |
| 2.2.4 对“园”的多样认识 | 26 |
| 2.3 造园的具体方式及其追求 | 27 |
| 2.3.1 “园”的景观营造 | 27 |
| 2.3.2 以建筑为主体的园林化环境营造 | 31 |
| 2.4 小结 | 32 |
| 3 明代中前期的江南园林(15 世纪) | 34 |
| 3.1 造园情况概述 | 34 |
| 3.1.1 文人造园的重兴 | 34 |
| 3.1.2 文人造园的延伸 | 43 |
| 3.1.3 江南造园与其他地区的关系 | 45 |
| 3.2 园林观念与造园作用 | 46 |
| 3.2.1 明初观念的承续和发展 | 46 |
| 3.2.2 新观念的凸现和特色 | 52 |
| 3.3 园林追求与造园实践 | 57 |
| 3.3.1 总体效果追求 | 57 |
| 3.3.2 “景”的认识与总体营造 | 59 |

| | |
|---|------------|
| 3.3.3 具体造景内容及手法 | 62 |
| 3.4 小结:复兴与新意 | 71 |
| 4 明代中期的江南园林(16世纪上半叶) | 72 |
| 4.1 名园述要 | 72 |
| 4.1.1 苏州府 | 72 |
| 4.1.2 松江府 | 82 |
| 4.1.3 常州府 | 84 |
| 4.1.4 镇江府 | 85 |
| 4.1.5 南京 | 86 |
| 4.1.6 其他 | 90 |
| 4.2 园林观念与造园作用 | 90 |
| 4.2.1 游观乐趣:园林的休闲作用 | 91 |
| 4.2.2 隐逸、修身及象征:园林作为精神追求场所 | 94 |
| 4.2.3 时代特色与园林观念 | 97 |
| 4.3 效果追求与园林营造 | 100 |
| 4.3.1 总体境界追求 | 100 |
| 4.3.2 山水景致与园林营造 | 106 |
| 4.3.3 总体营造方法 | 109 |
| 4.3.4 园林要素认识与营造技法 | 113 |
| 4.4 小结 | 123 |
| 5 明代后期的江南园林(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 | 124 |
| 5.1 各地名园个例分析 | 124 |
| 5.1.1 苏州府 | 125 |
| 5.1.2 松江府 | 143 |
| 5.1.3 常州府 | 148 |
| 5.1.4 杭州府 | 151 |
| 5.1.5 湖州府 | 154 |
| 5.1.6 应天府(南京) | 158 |
| 5.1.7 镇江府 | 164 |
| 5.1.8 扬州府 | 164 |
| 5.1.9 绍兴府 | 169 |
| 5.2 造园意义与园林观念 | 176 |
| 5.2.1 园林作用:新的多样性趋向 | 176 |
| 5.2.2 园林地位:营造投入与文学关注 | 183 |
| 5.2.3 复杂性与矛盾性 | 189 |
| 5.3 效果追求与营造方法 | 194 |
| 5.3.1 专业倾向:造园能手与理论著述 | 194 |
| 5.3.2 境界效果:体验与画意的并重 | 207 |
| 5.3.3 造园手法:深刻的变革 | 215 |
| 5.3.4 总论:风格的转向 | 227 |
| 5.4 小结 | 229 |

| | |
|--------------------------------|-----|
| 6 综论:转变中的特色 | 231 |
| 6.1 园林观念的转变:作用与地位..... | 231 |
| 6.2 园林欣赏的转变:效果与追求..... | 232 |
| 6.3 造园实践的转变:方法与风格..... | 233 |
| 6.4 小结 | 236 |
| 参考文献 | 237 |
| 插图目录 | 248 |
| 附录:明代江南园林记述主要文献目录 | 250 |

1 绪论

1.1 研究对象与意义

对时段性、地域性的关注是当前中国园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一方面,这是中国园林史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肇始于 1930 年代、重兴于 1980 年代的中国园林史研究^①,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有了多部对中国园林史总体研究的著作,基本把握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域的园林史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已成为中国园林史研究继续深化的需要^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来自于当代学术发展大背景下范式转型的外在推动。在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后现代学术浪潮的影响下,当代史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③;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尤以对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出发点的批判为甚,以“中国”作为整体论述对象受到置疑^④。在中国园林史研究领域中,一些海外的研究者对以往作出了深刻反思,尤其是常见的对“中国园林”认识的整体化、简单化的倾向:如冯仕达(Stanislaus Fung)反对“从归纳和抽象中获得中国园林的明确而普遍的特征”的做法,而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寻求中国园林研究中的特殊性和例证性”^⑤;柯律格(Craig Clunas)的作品甚至是“出于对(‘中国园林’)这一事物存在的怀疑”^⑥,他选取的是某一段时期的“有限地理区域”^⑦;在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看来,这种思路的变化体现了当前园林史研究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而这往往并非来自学科内部的竞争,而是“在外部竞争中为本学科寻求学术合理性(academic legitimacy)”^⑧。可以看到,受到外在学术转型的推动,中国园林史的研究有着从整体理解到以特定时段、特定地域来出发的转向趋势,而这已不再仅是原有研究思路的延伸。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本书选择明代江南园林为对象——以明代为特定时段、江南地区为特定地域——来进行中国园林史的深入研究,旨在努力推进当代园林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明代”这一时段的选取,对于在当代学术背景下推进中国园林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明代是中国园林史上的突出繁荣时期,明代园林文化的发达使其在中国园林历史研究中占有尤

① 对 20 世纪中国园林史研究状况的概述,可参见:Stanislaus Fung, “Longing and Belonging in Chinese Garden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 Dumbarton Oaks Colloquium on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1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Collection, 1999), p. 206.

② 陈薇教授通过对 1990 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考察,指出了“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的发展趋向,认为“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参见:陈薇《天籁疑难辨 历史谁可分——90 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建筑师》第 69 期(1996 年 4 月)]。作为广义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国园林史研究也处于这种趋势之中,时段性、地域性的深入关注正是其一种表现。

③ 对于后现代学术思潮对当代历史学的影响,可参见: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④ 比如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国”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受到置疑:“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5 年 8 月号)]。又比如中国美术史研究中也存在这样的看法:“根本就不要再写那种上下数千年、东西几万里的中国美术史了,因为这类宏观叙事不过是现代启蒙主义和进化论影响下的‘民族国家’的神话,如果有人在后现代的今日继续追求这种历史叙事(即使是以新的方式),就不免会有民族沙文主义之嫌。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因此以解构古代中国美术史为己任,在抛弃了宏观历史框架后着眼于对地方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巫鸿《“开”与“合”的驰骋出处》,《读书》2006 年第 5 期。]

⑤ 参见:Stanislaus Fung, “Longing and Belonging in Chinese Garden History”, p. 219.

⑥ Craig Clunas,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1996), p. 1.

⑦ 同上。

⑧ Michel Conan,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 Dumbarton Oaks Colloquium on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1 (Washington, D. 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Collection, 1999), p. 9.

其重要的地位。根据现有研究,在园林普及化方面,“明代私园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代”;在造园技艺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和创新,产生了众多高水准的名园;在造园理论方面,出现了《园冶》等突破性的重要理论总结;在园林文化内涵方面,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充实^①。此外,明代文人留下了丰富的关于园林的文献材料,尤其是大量的“园记”作品,为当代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明代园林研究同古典园林遗存的认知有重要的关联。对现有园林遗存的认知,是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体验的直接来源,是现代园林史学的开端和基础,也是理解历史上园林的重要参照;然而仅仅对现有形态的关注,也成为对“中国园林”简单化理解的根源。明代园林同园林遗存的认知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一方面,就其关联性而言,许多园林遗存创自明代,许多明代造园理念和手法沿用下来,从明代园林研究着手可以理清渊源,从而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园林遗存,有助于当代园林遗产保护事业的开展;另一方面,就其差异而言,认识到明代园林同现有园林遗存的深刻差别,又有助于破除对“中国园林”整体、静态的理解方式,而得到多样、变化的历史认识。

再次,明代这一时期的园林文化经历了明显的变化,有着动态研究的意义。“从明初到中叶,全国范围私家园林的发展比较迟缓”^②,而从明代中期以后,造园日趋鼎盛;对其中变化转折的研究,应避免在将历史时段分期的同时,又将明代这一时期视为静态的整体,从而可以在动态转折中细致考察园林史的发展。正如英国的艾克顿勋爵所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明代这一时段的选取,出发点并非在于对断代史研究的考虑,而是要考察中国园林史的多样性、动态性的问题。

“江南”这一地域的选取,更是因其特殊的地位而有着突出意义,同时与明代时段的选取也密切相关。

首先,在当代反对整体史观的学术背景下,对地域单元的选取不再任意可行,而是需要慎重思考;现以江南这样的区域,而不是常见的行政地理单位(如“省”、“市”)或其他习见称谓范围(如“南方”)作为研究对象,有其历史与学术的合理性。对“江南”而言,这一区域概念是历史形成的,因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的影响而逐渐成为相对完整、稳定的地理概念,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含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的范围”^③。而这种经济、文化上的概念认识也得到当代学术研究的支持:从经济地理上看,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根据社会经济层级关系而提出“宏观区域学说”,把明清时期的中国分为九大区域,而江南就是其中的一个区域单元^④,这一区域研究方法为中国史研究开创了新的思路而广受重视;从文化地理上看,以“文化圈”作为认识方式日渐受到重视^⑤,江南文化圈的认识已得到广泛认同。

其次,江南地区在中国园林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江南对于整个中国的意义,正如邹逸麟先生指出:“江南地区,自唐代后期以来,在中国人心中已成为备受关注的地区,其地位不亚于汉唐盛世的关中。就政治形势而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就经济而言,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全国的财赋重地。明人李乐《见闻杂记》:‘天下财赋仰东南,东南财赋多出吴郡。’……就文化而言,南宋以后,‘衣冠人物,萃于东南’……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经济文化诸方面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已为不争之事实。”^⑥所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由于经济之富庶、文化之昌盛为全国之冠,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之优越,江南地区的园林文化之繁荣也在全国有着突出的地位。汉宝德先生将中国古典园林史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南宋至明末的五百年间称为江南时代^⑦;周维权先生也指出,“江南的私家园林遂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后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代表着中国风景式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平。北京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园林,甚至皇家园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⑧。明代的江南园

① 对这四个方面的论述,参见:潘谷西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页390-396。

② 同上,页390。

③ 周振鹤《释江南》,《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1996),页334。

④ 参见: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242-252。

⑤ 参见:赵世瑜、周尚意《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10。

⑥ 邹逸麟《序》,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⑦ 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⑧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页257。

林,正是处在这一“高峰”之上。

再次,正由于江南园林的这种历史地位,对于江南园林的研究成为整个中国园林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对此的进一步研究又有着新的意义。童寓先生的《江南园林志》是中国现代园林史研究的起点,此后对江南园林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园林史研究中的热点,产生了如《苏州古典园林》、《江南园林论》、《江南理景艺术》等多部重要著作,这些作品已成为整个中国园林史研究中的扛鼎之作,成为继续研究江南园林史的坚实基础,同时也对后续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代新的学术研究取向下,通过从主要根据现有遗存而转向深入历史、探究文献,特别是选取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明代,对江南园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对江南园林得到新的认识,进而对整个中国园林史研究产生新的意义。

1.2 已有研究与评述

已有的与明代江南园林相关的当代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直接相关的明代园林史研究。其中与本书主题高度一致的,有王春瑜《论明代江南园林》一文,论述了明代园林的总体发展(尤其是“两次高潮”)、造园情况、营造特色、繁荣原因及借鉴意义。王先生是著名明史专家,他的这篇文章视野宽阔,尤其从社会、经济、文化的角度有着较为深入的剖析,其中提供的材料和观点对本书有直接的参考作用;但囿于篇幅,该文材料引用有限,也缺乏进一步分时期、分地域,乃至针对个案的详论,而对造园的技法方面还较少专业性的分析,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英国艺术史学家柯律格的《丰饶之地:中国明代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一书,虽然以“中国”冠名,实则主要研究的也是江南地区的明代园林。该书视角独特,主要从社会经济与审美观念关系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了明代中后期发生的深刻转折;该书的特色及出发点,如马克·杰克逊(Mark Jackson)对该书的评述:“在他对明代园林史的叙述中,柯律格清楚地表明,景观研究不能忽视土地作为商品,以及土地的拥有作为权力运用的保障这样的问题。当大多数中国园林研究从美学欣赏的角度来研究时,柯律格将美学问题置于一种将美、奢侈、荣耀与财富都联结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背景之中。”^①该书展示的方法上的突破提供了关于中国园林发展的新认识,对本书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该书的关注点相对集中且运用材料有限,在呈现出深刻性的同时,缺少对其他众多相关问题的论述,而远未揭示明代江南园林营造与发展的宽广面貌与细致变化。

潘谷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四卷·元明建筑》,其中有对明代私家园林的专述,也主要以江南园林为对象,从“园林的普及化”、“造园技艺的发展”、“造园理论的成熟”、“园林文化内涵的充实”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且对两个著名园林实例进行复原和分析,为本论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对于其他的案例研究、具体的转折变化,以及造园的观念特征,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此外还有赵熙春的硕士论文《明代园林研究》,其中专门有“江南的私家园林”一章,对明代江南园林的常见文献作了汇总,但缺乏分析。

二,基于江南地域性的园林史研究。一些针对江南地区内特定地区的园林史研究,如魏嘉瓛《苏州历代园林录》、《苏州古典园林史》,朱宇晖《上海传统园林研究》,其中在明代部分所提供的资料和观点成为本书写作的重要参考。

另外众多主要针对现有江南园林遗存的研究,在对现状作翔实细致的记录、介绍和分析的同时,也对明代时期的历史有所涉及,具有较强参考价值,如童寓《江南园林志》、杨鸿勋《江南园林论》、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这是关于江南园林整体研究的最重要著作;又如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朱江《扬州园林品赏录》,是针对特定城市地域内园林研究的重要作品。

此外,对于始创于明代或更早期的园林遗存,还有单独的书籍和论文研究,如王宗拭《拙政园》、周铮

^① Mark Jackson, “Landscape/representation/text: Craig Clunas’s *Fruitful Sites* (1996)”,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London & Washington D. C.), 19 (Autumn/Winter 1999), pp. 302-313.

《留园》、张橙华《狮子林》、孟平《狮子林史考》、刘叙杰《南京瞻园考》、郭俊纶《上海豫园》等等,其中关于这些园林在明代时期的论述都为本文提供了较为扎实的资料和分析基础。

三,对于明代江南造园文献及造园家的研究。第一手的原始文献是本书最主要、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前人已做的对相关文献的校注整理,为本书提供了直接理解引用的便利,以及核查原始文献的线索。其中陈植先生点校、注释的《园冶注释》、《长物志校注》,是对最重要的两本明末造园理论著作进行的校注,它们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园林史研究的进展^①;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园记作品的汇集,收录了众多明代江南的造园文献,如陈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造园文选》、《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也出版较早,影响广泛,而近几年出版的陈从周、蒋启霆二先生选编的《园综》和赵厚均、杨鉴生编注的《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三辑》,又大大扩充了明代江南园记的数量,也会对今后的研究产生持久影响。以上这些文献集中包纳了大多数明代江南“名园”的记述,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但对于整个明代江南的园林记载还远未穷尽,如明代前期的园记就有较多遗漏。此外,明代江南造园的信息还来自于大量的园记以外的文体形式中,这些都值得在浩瀚的典籍中继续挖掘。

随着众多明代江南造园文献得到梳理,出现了大批对这些文献的深入研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园冶》的研究。在1980年代初,就有一些探讨该文献的文章出现^②;在《园冶注释》出版后,针对该书又有新的讨论^③,其中张家骥《园冶全释》一书,又引发进一步争论^④,这些讨论使得对该文献的理解更为深入;此后至今,对《园冶》的研究文章仍不时出现,如张燕《山阴道上宛然镜游——论〈园冶〉的设计艺术思想》一文是从设计思想角度的探讨,张薇《〈园冶〉文化论》一书则是从广阔的文化领域进行关联理解。此外,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参与了对《园冶》的研究,哈蒂(Alison Hardie)和邱治平(Che Bing Chiu)分别把《园冶》译为了英文版和法文版并作评述^⑤,推进了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文献的认识;意大利学者泡利洛(Maurizio Paolillo)的《冶铸园林:〈园冶〉与17世纪中国园林的意义》(“Forging the Garden: The Yuan y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Garden in the 17th Century”)一文,对《园冶》中的一些要点作了解读。在众多对《园冶》的析读研究中,最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冯仕达的一系列文章,通过细读的方式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而得到尤为深刻的认识。试举几篇为例:《〈园冶〉中的“体”与“宜”》(“Body and Appropriateness in Yuan ye”),是针对关键词的细致解读,结合“比较哲学”成果的运用,在破除了主体与客体、身体与心智间二元对立的中国传统语境中进行阐释;《自我、景致与行为:〈园冶〉借景篇》(“Self, Scene and Action—the Final Chapter of Yuan ye”),是对《园冶》中最后一章的解读,针对行文方式(“流与旨”)、思考方式(“新与鲜”),以及主体与行为关系认识(设计与设计师)进行探析,通过文献修辞结构意义的关注和跨文化的思考,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后得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园冶〉的跨学科前景》(“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spects of Yuan ye”)一文,则突出展示了作者对方法论的关注,集中于跨学科与跨文化领域中阐发阅读的可能性,为这一文献在新的学术情境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新的研究思路给园林史研究带来的巨大推动力量,开辟了新的学术前景;这些无论在直接的历史认识还是在深层的方法思考层面都对本文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借鉴。

除了《园冶》,其他文献也得到深入的认识,如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态》(*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是对文震亨

① 《园冶》和《长物志》两种文献近来又有新的校注版本,如赵农注释的《园冶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海军、田君注释的《长物志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以及杨光辉编著的《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四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其中也包含这两种文献。

② 如喻维国《重读〈园冶〉随笔》,《建筑师》13期(1982年12月),页17-22;赵立瀛《试论〈园冶〉的造园思想、意境和手法》,《建筑师》13期(1982年12月),页23-27;等等。

③ 如曹汛《〈园冶注释〉疑义举析》,《建筑历史与理论》第3.4辑;邹博爱《与〈园冶注释〉注家商榷》,《华中建筑》1995(1),页74。

④ 如王绍增《〈园冶〉析读——兼评张家骥先生〈园冶全释·序言〉》,《中国园林》1998(2),页20-25;梁敦睦《〈园冶全释〉商榷(续一、续二、续三、续四)》,《中国园林》1998(1),页15-16;1998(3),页47-50;1998(5),页28-29;1999(1),页29-31;1998(3),页67-69。

⑤ Ji Cheng. *The Craft of Gardens*. trans. Alison Hardi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Ji Cheng. *Yuan ye: Le traité du jardin*. trans. Che Bing Chiu. Collections jardins et paysages (Besançon: Les éditions de l'Imprimeur, 1997).

《长物志》的专门研究,并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作了探讨。基于园记文献而开展的对于文人和园林的研究也在西方学术界越发受到重视,如祁彪佳“寓园”的研究,有坎贝尔(Duncan Campbell)的《祁彪佳〈寓山注〉:导读与翻译》(“Qi Biaoji’s ‘Footnotes to Allegory Mountain’: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将《寓山注》完整地译为英文;韩德琳(Joanna F. Handlin Smith)《祁彪佳社会世界中的园林:晚明江南的财富与价值》(“Gardens in Ch’i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则深入到园林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中去。冯仕达还有对另一类明人文献的解读,如《刘士龙的想象园林》(“The Imaginary Garden of Liu Shilong”)、《将就园注》(“Notes on the Make-Do Garden”),是分别对刘士龙《乌有园记》、黄周星《将就园记》的研究,结合跨文化的关联认识,从这种特殊的虚构园林的特定分析中获得对明末造园文化的深刻阐释。

在造园文献得到研究的同时,明代江南造园家的研究也得到开展。其中对《园冶》作者计成的研究是最突出的,除了陈植《园冶注释》中的探讨,曹汛《计成研究——为纪念计成诞生四百周年而作》是材料最翔实的一篇,吴肇钊《计成与影园兴造》则结合了作品的分析;《长物志》作者文震亨,也在陈植《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一文中得到细致考察^①;此外,曹汛《造园大师张南垣——纪念张南垣诞生四百周年》一文,则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证,对明末造园家张南垣有深入考察和分析;岳毅平《中国古代园林人物研究》一书,也对前述三位人物有所涉及;陈从周《明代上海的三个叠山家和他们的作品》,则又对张南阳、曹谅、顾山师有所考证。这些都成为本书相关内容研究的强有力基础。

四,总体的中国园林史研究。已有多部纵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园林通史”,其中也有对明代江南园林的涉及,可资参考。最早成书的是日本人冈大路写于1930年代的《中国官苑园林史考》,1988年出版中文译本,其中对明代江南园林文献材料的梳理,以及如绘画与园林关系的分析,至今仍有参考价值;1990年初版、1999年修订再版的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对一些明代江南园林的实例有较深入的分析,也有较强参考作用;其他另一些园林史研究,如张家骥《中国造园史》、安怀起《中国园林史》、陈植《中国造园史》、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其中的明代江南造园材料也有一定借鉴意义,这几本书中尤以新近出版的汪菊渊先生著作的资料性最强。

在众多园林史研究以材料描述及分析为主的同时,1990年出版的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2004年又更名为《中国园林文化史》出版),是别具特色的一部作品,“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文化史的深刻视角、文献的娴熟运用,为中国园林的文化基础作出了强有力的阐释,其影响之大使得之后的园林研究对“隐逸文化”难以忽视,也成为本书写作中某些论题的重要背景;然而该书在成就突出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局限,“在预设的黑格尔历史决定论前提下,将园林史与名义上的文化史、事实上的政治史捆绑在一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渐趋没落的呈堂证供,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在园林史上也是缺乏事实基础的”;而强烈的历史决定论色彩,也使得该书对于造园史进程中的复杂现象和具体变化缺少关注。事实上,黑格尔式的线性发展观在许多总体的中国园林史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使得本书在参考这些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审慎地注意到史观的差别。

此外,陈薇《中国私家园林流变》一文,从文人的追求出发,以对“自然”认识同造园手法关系的角度切入,通过细致的考察,勾勒出私家园林在各时期转折的轨迹;虽不是大型著作,行文简要,材料也有限,但视角独特,分析深刻,在中国园林史研究中有重要地位。这一对历时动态性的关注尤其切合本书的宗旨,其中明代江南园林部分的阐发,也成为本书写作的重要参考。

五,总体的中国园林文化研究。众多主要以现有园林遗存为对象的关于技术、艺术、美学、文化等的总体研究,也对明代江南园林研究有参考意义:不仅在于这些研究多少会涉及本书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当代对于“中国园林”的认识,成为本书写作必须面对的学术背景。这些作品中,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张家骥《中国造园论》,是较早完成的关于中国园林营造方法的论著;相对于这

^① 陈植《明末文震亨氏的造园学说》,《陈植造园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页193-204;也见于《长物志校注》,页429-441。

两部作品较强的建筑学色彩,王铎《中国古代苑园与文化》、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这几部著作则关注更深入的文化及美学的分析。除了这几部突出的作品,近二十多年间还出现了许多总论中国园林的作品,比如:乔匀主编,程里尧编辑《中国园林艺术》、钟华楠《中国园林艺术》、杜顺宝《中国的园林》、刘天华《画境文心:中国古典园林之美》、鲍榭蒂《中国园林》、封云《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园林艺术》、耿刘同《中国古代园林》、罗哲文《中国古园林》、楼庆西《中国园林》、周武忠《心境的栖园——中国园林文化》等等。而对中国园林艺术与文化整体特点的总结分析,还突出体现在一些中外园林比较研究中,如周武忠《寻求伊甸园——中西古典园林艺术比较》、曹林娣,许金生《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刘庭风《中日古典园林比较》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共同营造出当代中国园林文化研究的繁荣局面。

以上的这些作品对于中国园林营造及文化的研究,尽管思路并不一致,功力深浅不同,写法往往有很大差异,观点也可能存在分歧,但都有着视“中国园林”可整体把握和分析的前提认识,这一观念突出地反映在许多研究的这样一个共同之处:在全书的开端或局部,会大致叙述整个中国园林发展的历史;而在主体部分,则主要依赖现有园林遗存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园林的若干特点——在这样一种主要来自于现存园林分析的、被整体化的“中国园林”认识下,尽管历史叙述并不可少,但更在于是作为晚近园林的背景来源,历史上的丰富差异、细致转折被大大简化和忽略,对总体的“中国园林”形象并不产生多大影响。这样将现有园林遗存作为“中国园林”代表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线性发展观^①:园林史是有趋势的,越晚期越成熟,现存园林作为最晚一个阶段的产物,可以作为最佳的代表;在这种“进化”的历史观指引下,园林史被简单理解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规律的注解。在当代新的学术思潮中,这种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线形发展的历史观已不再被认可,对中国园林的整体理解成为需要反思的问题;当今的中国园林研究,需要突破习见的整体化、静态化、简单化的认识方式,这尤其要深入到园林史研究中,在特定时空中对复杂多样的动态变化作出细致的考察。

六,其他相关研究。除了以上同明代江南园林有较为明显关系的研究外,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也可以起到一定参考作用。比如一些关于园林的辞典,如张家骥编著《中国园林艺术大辞典》、陈从周主编《中国园林鉴赏辞典》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关于明代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研究中也涉及江南园林,如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等等。

综上所述,涉及明代、江南的园林研究目前已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专门集中针对这一特定时期和地域的详细论述并不多见,而所论或在范围上、或在视角上、或在深入程度上都往往有限。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较多地存在这样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研究材料上的局限。目前深入探讨历史造园情形的研究,依赖的主要材料是当时的“园记”,但明代江南园记文献的发掘和使用,现在还比较有限。已有研究中最重要依据,是陈植先生所编的两本园记选集,虽然所选篇数并不算少,但对于极其丰富的明代江南造园而言,所能展示的历史状况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尽管近来又有新的园记材料出版,但还尚未进入到研究,未在成果中体现;而即便是加上这些新的材料,对于探讨整个明代园林的发展,还是远不足够,需要进一步在丰富史料中寻找发掘。二是认识方式上的局限。众多研究由于对“中国园林”的认识主要集中于现有园林遗存,对于明代江南园林的理解突出着眼于对晚近园林的关系和意义,因此缺乏对发掘更多样材料、研究更细致变化的动力,从而较少对明代期间自身的动态转折性、江南园林内部的复杂多样性的关注。这两个较为普遍而突出的问题,成为本书开展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1.3 研究方法 with 结构

中国园林史研究,有着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方法特点:所谓“论从史出”,这包含“史”(史料)与“论”(论述)两个方面;而在本书中,又针对前述当代研究中的较为突出的两大问题,在两方面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方

^① 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历史会直线发展,不断走向进步。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页138。